

收稿日期:2022-04-10

曾巩为什么较少写词?

——一种文化学的解释

常毓晗¹, 刘卓²

(1. 澳门大学 中文系, 澳门 510640;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北宋散文家曾巩在散文、诗歌、史学方面著述甚丰, 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 遗憾的是, 在词这一体裁高度发达的宋代, 曾巩仅留下了一首词。渊静沉着的个性特点、谨重平正的醇儒身份认同感、严谨平稳的文学性格, 是其较少写词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曾巩; 宋词; 个性; 身份认同感; 文学性格; 醇儒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873(2022)04-0075-08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山水诗简史”(2021262)。

作者简介:常毓晗(1996—), 男, 湖北武汉人, 澳门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刘卓(1988—), 男, 湖北英山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DOI: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2.04.055

曾巩以其散文创作成就跻身“唐宋散文八大家”之列, 同时还留下了四百八十多首诗歌和一部历史著作《隆平集》。但是, 在曾巩留下的全部作品中, 竟然只有一首《赏南枝》词。这在词高度发达的宋代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曾巩为什么较少写词? 这在南宋时期就有人注意到了。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渊静沉着的个性特点

曾巩曾多次自道其性, “人之性不同, 于是知伏闲隐坳, 吾性所最宜。驱之就烦, 非其器所长。况使之争于势利、爱恶、毁誉之间邪?”(《南轩记》)^①“人生省已分, 静默固其端”(《杂诗五首》之四), “我亦本萧散, 至此更怡然”(《招隐寺》), “颇识麋鹿性”(《初发襄阳携家夜登岷山置酒》)等。这些诗句表现了他厌恶喧嚣、喜欢安静的本性。对自己的亲朋好友, 曾巩也着力赞美他们的蔼然温厚、渊静沉着的一面, 如赞扬自己的二妹“恭严诚顺”(《江都县主簿王君夫人曾氏墓志铭》), 九妹“柔愿静颀”“平居温温”(《仙源县君曾氏墓志铭》), 说自己的弟弟“质直孝悌”“抑畏小心”(《亡

① 文中引用的曾巩诗文均出自中华书局1984年版《曾巩集》, 陈杏珍、晁继周点校。不一一注出。

弟湘潭县主簿子翊墓志铭》),说侄儿“为人恭谨,循循寡言”(《亡侄韶州军事判官墓志铭》)。曾巩自认是一个不喜浮华的淡泊自守者,这样的个性特点与北宋早中期以婉约词为主、追求软媚的创作风格有差异,这可以当作是曾巩较少写词的一种解释。对曾巩的为人与为文的关系,有很多人曾做出评价。如朱熹在《跋曾南丰帖》中云:“余年二十许便喜读曾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今五十年,乃得见其遗墨,简言静重,盖亦如其为文也。”^[1]“简言静重”是对曾巩遗墨的评价,也是对曾巩为人的评价。清刘熙载认为曾文的形成与曾巩的个人性情、人生态度有直接关系:“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王介甫云:‘夫安驱徐行,鞫中庸之廷而造乎其室,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二贤,谓正之、子固也。然则子固之文,即肖子固之为人矣。”^[2]在朱熹、刘熙载看来,曾巩为文与为人存在对应关系,其渊静沉着的个性特点对其平正温雅文章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因而,按照这样的逻辑,曾巩是不大可能将精力投入到词的创作上。

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如其人”的老命题。事实上,细细寻绎,曾巩也不是一贯的静重泊如。由于年龄、阅历、修养的关系,他的文学创作也有前后期的不同。曾巩同时代人王震《南丰先生文集序》云:“南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异时齿发壮,志气锐,其文章之剽鸷奔放,雄浑环伟,若三军之朝气,猛兽之抉怒,江湖之波涛,烟云之姿状,一何奇也。方是时,先生自负要似刘向,不知韩愈为何如尔。中间久外徙,世颇谓偃蹇不偶。一时后生辈锋出,先生泊如也。”^[3]他认为曾巩因为年龄的原因,在文章风貌上有着从“剽鸷奔放,雄浑环伟”到温静平和的变化,在应物处事上也从“志气锐”的少年意气修炼成“泊如”的老成持重。翻阅曾巩早期的诗文,也的确可以看到一个因为理想不得实现而愤郁满怀的诗人形象,如他的《送陈商学士》:

柳黄半出年将破,溪溜浸苔强万个。溪头蒲苇各萌芽,山梅最繁花已堕。物色撩人思易狂,况跻别馆情何那。城东日晚公将去,熏影未离愁四座。公于万事不雕镌,心意恢恢无坎垓。来从奎壁光铎下,笑倚樽筵成郡课。嗟予龊龊才性下,弃置合守丘樊饿。公持姓名动人主,被饰宁嫌笔端挫。从今清夜思江路,梦送公船先北过。

这是一首送别诗,在万物萌生的初春时节,诗人没有因美好的春光而心情愉悦,却是满怀“物色撩人思易狂,况跻别馆情何那”的愁绪,这样的情绪好像由于与陈商的离别而引发,实质上却来自于诗人自身的原因:“嗟予龊龊才性下,弃置合守丘樊饿。”在人生的早期,曾巩有着这个年龄常有的天真与激情,他“所慕少壮成功名”(《初夏有感》),幻想着自己能够“力挽白日之西颓”(《冬望》),并且“何秽不欲亲芟锄”(《寄孙之翰》)。在经历了一系列人生的不幸和打击、尝尽了人间冷暖与世态炎凉后,他开始认识到社会的复杂、人生的不易。因而,初春生机勃勃的景象也安抚不了他那躁动的心,他为功名不得而忧愁愤郁,从而产生失望、不安、幽怨甚至愤激的情绪,“著书岂即遽有补,天下自古无能才”(《冬望》),“谅知草茅微,无补社稷重”(《青云亭闲望》)。不过,以此来推翻曾巩醇儒的形象是不妥的。因为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可能面对复杂纷纭的现实生活而完全无动于衷,如果完全做到那种“太上忘情”的状态,则脱离了儒家关注现实人生的基本原则而走向了老庄道家或佛教的出世哲学。从根本上而言,曾巩的诗文真实地反映了其人生经历中的思考路径和处世方式,也是其胸襟人品、精神气质和艺术个性的忠实展现,只是在前后期有着因年龄、阅历、修养等因素带来的风格上的不同。对曾巩而言,从愤郁不平走向淡泊平和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他在长期的人生历练中不断敬业修德的结果。

因而,“文如其人”实际上并不能概括说明曾巩一生文与人的关系。他在“齿发壮”的青年时代是“志气锐”的,渊静沉着只是他人生的主导面。他在文章风格上也有着“剽鸷奔放,雄浑环伟”的一面,而平正温雅只是他诗文创作的风格。事实上,“文如其人”是一个不怎么经得起推敲

的命题,因为作家们往往心口不一。元好问有一首讽刺诗:“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①标榜自己与世无争的潘岳有“拜路尘”的谄媚;性格刚毅者也会弹奏出娇媚软红的调子,如“铁面宰相”宋璟著有《梅花赋》;平静淡泊者亦有金刚怒目式的豪放,如“五柳先生”陶渊明有《读山海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曾巩生活的宋代,这种错位的例子似乎更多。例如范仲淹,一生直节立朝,刚正不阿,写的《苏幕遮》婉丽深情,正如王奕清《御选历代诗余》引《词苑》云:“‘碧云天……’公之正气塞天地,而情语入妙至此。”^[4]欧阳修为人刚直正派,立朝忠言谏论,犯颜直谏,但这并不妨碍他创作儿女情长的“艳词”,其创作的“艳词”甚至成为政敌诬陷他“惟薄不修”的把柄。王安石以大刀阔斧的改革家面目示人,仍然有着“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石榴》)这样清丽可人的诗句。潘岳的人品与文品不一、宋璟的“铁面”形象与其笔下娇媚的梅花意象之不同、陶渊明的淡泊与荆天的猛志大异其趣、范仲淹的直节与其书写的黄叶之婉丽截然不同、欧阳修的刚直与艳词的浮靡之间的巨大反差,都表现出“文如其人”这一说法的不可靠。因而,说到这个话题,的确还得根据具体的作家作品来看,而不能千篇一律地进行归类。

据此,联系历史上诸多作家创作的事例以及曾巩文章创作风格的发展变化可知,仅从自道其性来判断曾巩因为淡静的个性原因而较少写词似乎不能自圆其说,因为淡静的作家也有可能写出猛志的篇章,猛志的作家也有可能弹出软红的调子。因而,个性上的淡静并不能成为评断曾巩较少写词的唯一根据,光从个性及为人处事方面来判定曾巩较少写词的原因显然理由还不够充分。

二、平正谨重的醇儒身份认同感

在宋代复兴儒学的大潮中,曾巩以其平正谨重的醇儒身份与同时代的文学家相区别,具体体现在学术旨趣、为文态度、立身行事上。

一是学术旨趣单纯。曾巩对经学的热情在十六七岁以后开始显现。自此以后,他一生研究儒家经典。少年时代“考先王之遗文,六艺之微旨,以求其旨意之所存”(《与章学士书》),“日夜刻苦不敢有愧于古人之道”(《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壮年时期仍然不改初衷,在给杜相公的书信中写到:“巩年齿益长,血气益衰,疾病人事不得休,然用心于载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绪言余旨以自乐于环堵之内。”(《上杜相公书》)曾巩的学术旨趣非常鲜明,他对儒道的皈依可以在与前朝或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比较中见出。比如,韩愈的思想源于儒家,但又认为百氏杂家尚有可取,他在《读墨子》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5]他提倡儒家之道,却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柳宗元《送僧浩初序》从“统合儒释”的角度提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有以佐世”^[6]。欧阳修反对佛老,但能从人情的角度予以理解,他在《崇文总目》中表示,法、墨、纵横、农、杂诸家皆有可取处。三苏则佛老兼信,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苏轼将儒、道、释三种思想和合会通,认为它们在本质上是

①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一亦记其事:孔子曰:“富贵在天。”则所谓富贵者,岂可以幸取乎?潘岳急于进取,乾没不休,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辄望尘而拜,其为人何如也。观其作《闲居赋》曰:“岳读《汲黯传》,至司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书之,题为巧宦之目。遂慨然叹曰:巧诚有之,拙亦宜然。”观岳此语,尚恨巧之未至邪?其作《河阳县诗》则曰:“谁谓晋京远,室迩身实辽。谁谓邑宰轻,令名患不劬。”其作《怀县诗》则曰:“自我违京辇,四载迄于斯。器非廊庙姿,屡出固其宜。”其坐驰京阙,渴心固已生尘矣。而仕宦卒不达,诚可以为驰骛者之戒也。尝自叙云:“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迂者三而已。虽通塞有命,抑拙者之效也。”岳诚知此,岂肯遽下贾谧之拜哉?(载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570页。)

相通的。他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7]873}。苏轼在《祭龙井辩才文》中云：“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动，江河虽殊，其至则同。”^{[7]2032}王安石早年以改革弊政为己任，晚年在仕途阻遏、改革不顺的情况下，也向佛家寻求心灵上的慰藉。王安石《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8]以上诸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讲儒道时兼融佛道。与他们不同，曾巩对道的追求显出心无旁骛的态度，坚持孔孟以来的儒家正统观念，还列出了一条由孔、孟、荀、扬、韩愈直至欧阳修相传而下的道统统系，体现出一位纯粹儒者的纯粹性。他认为先王之意即道之所在。他说“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并起，佛最晚出，为中国之患”（《梁书目序》）。他还反对刑、名、兵家，认为“刑名兵家之术，则狙于暴诈”（《筠州学记》），把诸子百家和佛道作为先王之道的对立面而予以坚决否定。在恪守儒道的过程中，曾巩将儒学与佛学进行比较，从理论上深度挖掘儒家思想和佛教学说之间的不同，力求排击佛教。他对佛道的经典也借鉴，但目的只是积学以储宝，最终以儒道为标准进行筛选、总结。

二是为文谨重严肃。曾巩在诗中一直自称为愚拙之人，“愚”“拙”“朴”是其诗中经常出现的字眼，“从来万事固已拙，况乃病敦颜不少”（《代书寄赵宏》）、“由来懒拙甚，岂免交游寡”（《江上怀介甫》）、“岂惟智所拙，曾是力难任”（《青云亭闲坐》）、“念时方有为，众智各驰骋。独此得逍遥，固知拙者幸”（《北湖》）、“赖此荒僻郡，幸容朴愚人”（《闻喜亭》）。他在《送黎安二生序》中曾自道其“迂”以自我解嘲，其为人的“迂”，凡事坚持原则的性格在言行中也体现出来。他的《熙宁转对疏》和《移沧州过阙上殿书》前后相隔十一年，但叙述内容基本不变。他还在《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中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愚臣孤陋，熙宁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转对幸得论事，敢据经之说，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之道必本于学为献。逮今十又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光，敢别白前说而终之。”一个人的思想总会因为年龄、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发生一些相应的改变，何况自庆历至元丰，整个北宋王朝人心思变，改革之风激荡，但是曾巩始终抱定其注重修身、教化治国的理念不变。其《书与客言》《上杜相公书》《送丁琰序》等文都一再表现了他对文章的慎重态度。

这种为文严谨严肃的态度在墓志铭中有更突出的表现，几乎每一篇都必交代自己与墓主的关系，以证明自己的文章不是随便妄作，甚至为撰写墓志铭而提出“蓄道德而能文章”的大议论。

北宋初中期的科举制度，仍旧沿袭隋唐旧制，虽然录取人数增多，但在考试内容上却没有什么变化。如进士科仍以诗赋为主，对声律有严格要求，崇尚华辞丽藻。这种情况直到嘉祐二年（1057）由欧阳修知贡举才得以改观。对这种科举取士制度，曾巩一方面深致不满，一方面仍然按自己的古文作文方式去应试，屡屡失败却不改弦易辙。这一点颇让欧阳修佩服，欧阳修年轻时为了应试，是花了工夫攻时文的，他在《书旧本韩文后》中云：“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容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9]王安石与曾巩曾在同一年参加科举，王中进士而曾落榜，这说明曾巩的文章在当时相当不合时宜，而曾巩坚持用古文作文应试长达二十年，足可见其“迂”了。这样的“迂”在热衷奔竞的人那里自然是不知变通、愚笨迂腐的代名词。但是在曾巩那里，“迂”是守正不迁的一种姿态。

三是立身端雅持重。曾巩在给欧阳修的书信中屡称“家世业儒，故不业它”，“寡与俗人和”，“抱道无所论”（《上欧阳学士第一书》）。郭预衡认为他“不是道学家，也不是政治家；虽被称为古文家，而实在是个以儒者自居的学者”^[10]，这种评价颇符合曾巩给自己规定的目标。他给自己设定的规范，远远超过常规。这与爱风雅的文人态度完全不同，他对日常生活伦理准则的认真态度也是超常的。在父亲去世之后，他以一己之力担起扶老携幼的重任，对继母恭谨孝顺，对弟弟妹妹尽心尽力。其弟曾肇对他的勤勉孝顺有较为细致的说明：

初，光禄仕不遂而归，无田以食，无物以居，公时尚少，皇皇四方，营飧粥之养。光禄不幸

早逝,太夫人在堂,阖门待哺者数十口,太夫人以勤俭经理其内,而教养诸弟,相继得禄仕,嫁九妹皆以时,且得所归,自委废单弱之中,振起而亢大之,实公是赖。平居未尝去远太夫人左右,其仕于外,数以便亲求徙官,太夫人爱之异甚。^{[11]795}

朱熹对曾巩非常推崇。韩、欧、苏虽然也重道,提倡道德修养,但由于他们在道的内涵上与朱熹的理解相差甚远,因此,在朱熹看来,他们的道德修养是很不够的。他批评韩欧苏等古文家为人的缺陷,即未能把功夫放在修身养性上,而把许多时间浪费在诗酒戏谑上。他说韩愈:“只于治国平天下处用功,而未尝就其身心上讲究持守。”^[12]他又说苏轼:“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功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13]他认为欧阳修在为人方面存在着缺陷。他在《读唐志》中先评论韩愈说:“读其书,则其出于谄谀戏豫,放浪而无实者,自不为少。”接着又评论欧阳修:“然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14]尽管朱熹没有直接表扬曾巩的为人,但为曾巩做过年谱的朱熹自然会注意到曾巩为人的严谨自守,终身不涉“诗酒戏谑”。如果将朱熹对韩、欧、苏为人方面的猛烈抨击综合起来看,对曾巩为人的赞赏是包含在他的一些评论中的。

宋太祖对士大夫有多买珠玉田宅以遗子孙、多蓄歌儿舞女以享天年的“鼓励”(《宋史记事本末》卷二)。在宋代优待士大夫的环境里,士人队伍壮大,士人经济状况改善,士人间的交游和结盟活动频繁,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此时期诗酒唱和与诙谐戏谑之风交杂一起,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范仲淹属意小鬟妓”条就记载范仲淹属意小鬟妓,“(魏)介因鬻以惠公”之事^{[15]307},又记“刘原父感官妓得病”事^{[15]302}。范、刘都是能以直节立朝的人,但这些文人似乎并未因风流韵事受到非议。然而,翻阅宋代的正史、野史、笔记、诗话等众多文史资料,的确找不出有关曾巩风流韵事的记载。这样看来,曾巩这种“迂腐”的个性与词那种婉约软媚很不搭调,而这应该是曾巩较少写词的另一个原因。

三、严谨平稳的文学性格

“诗庄词媚”,这是诗与词从内容到风格上的大致分野。然而,在曾巩生活的北宋中期,由于物质生活的富足,统治阶级的提倡,诗歌也呈现出诙谐戏谑之风。欧阳修《礼部唱和诗序》中所记嘉祐二年的礼闱唱和,已是“相与作为古律、长短歌诗杂言”、“时发为奇怪,杂以诙嘲笑谑”、“为言易而近,择而不精”、“其言无所不有”^[16],虽然还是诗歌,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自由随意。词被称为“诗余”,写词成为士大夫精神生活的另一面,词中怜香惜玉、风花雪月的文人情怀堂而皇之地进入士人交往的精神领域。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虽为有宋一代名臣,都是直节立朝之士,但是日常生活却很丰富,都写有相当数量的词。欧公有词两百多首,年轻时风流倜傥,生活浪漫,时常携官妓游于歌台舞榭,或狎嫖娼优以逢场作戏,其词缠绵婉转。苏轼虽然开创了豪放词,但婉约词仍占主要地位,在苏轼的三百五十余首词中,直接、间接涉及歌妓的约一百八十首,占苏词总数的一半以上。从交际、习俗等当时的社会氛围而言,这是极普通的,而且宋代朝廷也是默认甚至鼓励的。

在这样一个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的文人社会中,仅有一首《赏南枝》词据说是曾巩所作。那么,曾巩词在漫长的岁月中是否有佚失的可能性,从而导致只留下一首词?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有李清照的评价可参证:“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17]李清照对曾巩作词用了一个“若”字,翻译这一句就是:“曾巩如果作词,一定会让人前仰后合地大笑。”这是李清照(1084—1141)对曾巩(1019—1083)作词所可能产生的效果进行的判断,从这一点可以推测曾巩生前很少作词。李清照生活的早期主要是1127年南渡之前,北宋王朝整体还算安定,曾巩也没有卷入党争之类的漩涡,加之他当时以文章名世,如有词不会像山野之人的作

品那样湮没无闻,应该能够保存下来。李清照在曾巩去世后次年出生,其长大成年距曾巩去世只有十几年时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中,曾巩如有词作不可能全部散佚,作为词人的李清照如果看到曾词,是不必对曾巩作词作出假想的。因此,曾巩只流传下来一首词的原因,不是散佚了,而是他较少涉足词这种体裁的创作。

不仅较少涉足词创作,曾巩还较少涉足比较随意的诗话、题跋、随笔类文章的创作。欧阳修首创诗话这一体式,《六一诗话》提到写诗话的目的是“以资闲谈”,刘攽《中山石话》、司马光《温公续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也大致如此,司马光甚至直接说是模仿欧阳公而作:“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18]王安石虽没有诗话,但记载他论诗谈艺的诗话内容却相当多。据郭绍虞《宋诗话考》,宋人诗话作品可考者多达一百三十余种,流传至今者尚有四十余部,蔚为大观,可见当时之风靡一时。作为欧阳修最得意的弟子,曾巩并没有在这个方面去探索,没有写诗话。对此可以仔细分析一下。诗话这种体裁本从笔记中脱出,由于笔记是一种杂录式的散文体裁,以借事抒情、夹叙夹议为特色。篇幅可长可短,态度可庄可谐,所以很多文人乐意为之。此外,诗话在形式上受语录体的影响,体制上采用条目式,由一条一条的言论行事等语录条目组合而成,语言上比较活泼自由,平易浅近^[19]。曾巩散文风格的平正温雅表现在情感上是温厚平和,在结构上则包蕴密致,在语言上则显得儒雅深醇。这与诗话体裁情感态度的亦庄亦谐、篇幅体制的可长可短、语言的轻松随意有着不小差距。

至于题跋这种体裁,曾巩倒有一些尝试。有宋大量写作题跋是从欧阳修开始的。可将曾巩与欧阳修、苏轼等人的题跋作一比较,欧阳修有443首,苏轼有727首,黄庭坚有400多首,曾巩只有14首。欧阳修的题跋同样体现“六一风神”之感慨淋漓的特点,苏轼的题跋不仅数量惊人且内容驳杂,如《苏轼文集》分为题跋文、诗词、书帖、画、纸墨、笔砚、琴棋、游行等类,其题跋文内容丰富,或评文论艺,或雅集谐谑,总之是挥洒笔墨,着笔成春。曾巩“集古篆刻,为《金石录》五百卷”,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曾巩集》中,收有金石录跋尾十四首,算是对宋代勃兴的题跋文的一种响应。但比之欧苏诸人,曾巩的题跋写作并不随意,而且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道德说教意味。

笔记这种体裁滥觞于魏晋,发展于隋唐而盛于宋。宋人笔记流传至今的达四十多种,亦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文学体式。欧阳修《归田录》记录“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20]1907},并自称依唐李肇《国史补》例:“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苇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诫,采风俗,助谈笑,助谈笑,则书之。”^{[20]1942}总而言之,主要是记事实、探物理、助交际、正立场、示劝诫、助谈笑等类。在实际写作中,由于作者偏好不同,许多笔记往往偏重其中某些功能。从文体角度而言,笔记是一种杂录式的散文体裁,以借事抒情、夹叙夹议为特色,篇幅可长可短,态度可庄可谐。与曾巩同时代人如苏轼著《东坡志林》、苏辙著《龙川略志》《龙川别志》、司马光著《涑水记闻》、文莹著《湘山野录》《玉壶清话》、邵伯温著《邵氏闻见录》等,但曾巩也没有涉足这块领地。其实,诗话、题跋、笔记诸体裁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无意为文”,因而显得短小、自由、活泼。这与曾巩写作古文时秉持“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名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的严肃态度也不太相合。

此外,赋这一文体在宋代发展为文赋,更具散文文化的特点,俗语、散语夹杂其间,议论、问答纵横恣肆。欧阳修有5篇赋,王安石有《思归赋》《历山赋》2篇,苏轼的辞赋创作更多,共有27篇,其中《赤壁赋》《后赤壁赋》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苏辙的《墨竹赋》《缸砚赋》也很出色。曾巩未留下一篇赋体散文,文赋那种灵活自由、议论风生的写作风格无疑也与曾巩平实谨重的文风相左。

宋代士人在散文和诗歌中抒发着治国平天下的严肃主题,诗话、题跋、笔记的勃兴与宋代文人的风雅追求有直接关系,但曾巩很少参与其中。曾巩文学的基本性格是严谨、平稳、凝缩。除了散文和诗歌,曾巩很少涉足宋代其他勃兴的文学样式。而且,在他的文章中找不到对文学技巧

的刻意追求。比喻、隐喻几乎没有,而多为详尽的论理;对句式的结构也用,但无必要时少用;文字语言上避免使用希见之字和俗语口语。这也许使他的文章看起来过于平直,但由于他对经典的钻研很深和对生活的体会与洞察,其文章内容并未走向空疏浮薄。总之,曾巩的创作充分显示了其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体现出“以文为用”的鲜明特点,林希《曾巩墓志》说他“未尝著书,其所论述,皆因事而发”^[21]。曾巩对为文学而文学、为学问而学问的立场是断然排斥的,处处显示出他的严肃性。即使像墓志铭这种带有社交性质的文字,也被他写成有关道德修养的大文章,其墓志铭篇篇不离谈儒论道。他的目录序,本是叙写成书经过的,却用来大谈关于历史兴废、礼乐教化。曾肇说他“平生无所玩好”,如果有所爱好的话,那就是“顾喜藏书,至二万卷,仕四方,常与之俱,手自雠对,至老不倦”^{[11]795}。在对知识的探求中,曾巩有这样一段话:

方其始也,求之贵博,蓄之贵多。及其得之,则于言也在知其要,于德也在知其奥。能于是矣,则求之博、蓄之多者,乃荃蹄而已。所谓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蓄之不多,则未有于言也能知其要,未有于德也能知其奥,所谓寡闻则无约,寡见则无卓也。(《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

由此可见,曾巩关于博与约的讨论颇同于理学家在修养方法上的路径探讨。从曾巩自己的解释看,博览群书是一种增加学问的途径,究竟算不上文人的风流情趣。

从这些具体的例子可以看出,作为醇儒的曾巩相当严格,这种严谨与爱风雅的文人态度完全不同,他在日常伦理态度上也是极端认真的。这种生活态度,自然而然地使他提出了“蓄道德而能文章”的文学主张。总之,曾巩为文,均秉持这种严肃的写作态度,其诗文均承担着“扶衰救缺”的经国大任。这应该是曾巩较少写词的另一力证。

渊静沉着的个性特点、谨重平正的醇儒身份认同、严谨平稳的文学性格,将这三点综合在一起,大约可以推知曾巩较少写词的原因并不是不擅长,而对软媚绮错的词下功夫较少罢了。

参考文献

- [1] 刘埙. 隐居通议[M]//王云五. 丛书集成初编.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50.
- [2] 刘熙载. 艺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
- [3] 王震. 南丰先生文集序[M]//曾巩. 曾巩集. 陈杏珍,晁继周,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4:810.
- [4] 沈辰垣,王奕清. 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十四[M]. 康熙内府刊本:5.
- [5] 韩愈. 韩愈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29.
- [6] 柳宗元. 送僧浩初[M]//柳宗元. 柳宗元全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10.
- [7] 苏轼. 苏轼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8] 王安石. 洙水军淳化院经藏记[M]//王安石. 王安石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18.
- [9] 欧阳修. 书旧本韩文后[M]//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 北京:中华书局,2001:1056.
- [10] 郭预衡. 曾巩的为人和为文[M]//郭预衡. 历代散文丛谈.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326.
- [11] 曾肇. 曾巩行状[M]//曾巩. 曾巩集. 陈杏珍,晁继周,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2] 朱熹. 答寥子晦[M]//朱熹. 朱文公文集:卷45.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7.
- [13] 朱熹. 朱子语类:卷一三〇[M]. 北京:中华书局,1986:3113.
- [14] 朱熹. 读唐志[M]//朱文公文集:卷七〇.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5.
- [15] 吴曾. 能改斋漫录:卷十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16] 欧阳修. 礼部唱和诗序[M]//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 北京:中华书局,2001:597.
- [17] 李清照. 李清照集笺注[M]. 徐培均,笺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32.

- [18] 司马光. 温公续诗话[M]//何文焕. 历代诗话. 北京:中华书局,2004:247.
- [19] 徐中玉. 诗话之起源及其发达[J]. 中山学报,1941(1):115-120.
- [20] 欧阳修. 归田录[M]//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卷一二六. 北京:中华书局,2001.
- [21] 林希. 曾巩墓志[M]//曾巩. 曾巩集. 陈杏珍,晁继周,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4:799.

Zeng Gong's Scarcity in Ci Poetry Writing: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CHANG Yu-han¹, LIU Zhuo²

(1.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510640, China; 2.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56, China)

Abstract: Zeng Gong (1019—1083) was a writer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o is famous for his productive prose, poetry and studies on history. These works constitute a precious cultural legacy, in which only one Ci poem was found. Ci poetry flour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His conservative, meditative personality and prudent, impartial and ardent Confucian identity and meticulous, moderate literary style are th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his scarcity in Ci poetry writing.

Key words: Zeng Gong; Ci poetry of Song Dynasty; personality; identity; literary style; ardent Confucian

〔责任编辑:王建霞〕